

三十二体篆字《御制盛京赋》满汉文化的完美融合

□ 朱志美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沈阳为后金进入中原的基地。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（1625）三月迁都沈阳，天聪八年（1634）四月，皇太极传谕沈阳城系“天眷盛京”，满语为“mukden”，汉译“盛京”。盛京城，除堂子为女真人传统祭祀建筑外，其他都是历代都城必有的国家机关和象征皇权的礼制建筑，保留女真遗风，融合中国传统都城规制，成为满汉一体的都城。此地以满洲人的发祥地而著称，深受清代历朝皇帝的崇敬。清入关后，先后有四位皇帝共十次东巡盛京谒陵，分别为康熙帝三次、乾隆帝四次、嘉庆帝二次、道光帝一次。东巡活动除祭祀盛京祖陵外，还行围习武、考察吏治、联络蒙古、关心农牧、修葺城垣、提倡文化。在历次东巡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，诗词歌赋数量尤多，其中以乾隆帝所作《盛京赋》最为著名。

乾隆八年（1743），乾隆帝第一次东巡谒陵祭祖。抵达盛京故宫大政殿时，他诗兴大发，创作了汉文《盛京赋》。该作品是乾隆帝众多文学作品中唯一一篇以都市为题材的大赋。《盛京赋》继承汉文赋“铺采摘文，体物写志”的特点，着力写景，并借景抒情。全篇分序、赋、颂三部分，追述满族起源演进，缅怀先祖丰功伟业，赞扬盛京人文地理，郑重训诫宗室子弟及文武百官要“思开创之维艰，知守成之不易”，“兢兢业业，畏天爱人”。流露出作者对开国功臣们的尊敬与缅怀之情，对旧都“盛京”——满洲发祥之地这个文化符号的格外敬重。

篆字本《御制盛京赋》乃是以满、汉两种文字，分别用三十二种篆体缮写而成。书前有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，说明编纂该书的缘由：“我朝国书，音韵合乎元声，体制本乎圣作，分合繁简悉协自然。惟篆体虽旧有之，而未详备，宝玺印章尚用本字。朕稽古之暇，指授臣工，肇为各体篆文。儒臣广搜载籍，据授古法，成三十二类，且请以朕制《盛京赋》缮成清汉篆文，既广国书，并传古篆。”乾隆帝因满文篆字的不完备而指授臣工创制、完善满文篆字。而儒臣们广搜载籍，追踪汉字史，归纳汉文篆字为三十二种，参照汉字造字法与自然物象事理，新创三十二体满文篆字，并奏请以其缮写乾隆帝所作《御制盛京赋》，既可弘扬国书，又可使古代篆字流芳于后世。乾隆帝允其所请。故而《御制盛京赋》成为传播满文三十二体篆字的一个主要媒介，也成就了与汉文篆字有机融合的完美诗篇。该书于乾隆十三年由武英殿刊行，全书共六十四册，凡三十二体满汉文篆字，每体篆字满汉文各成一册，每种篆体后皆附《篆文缘起》，记载此篆体由来等内容。

满、汉文篆字本《御制盛京赋》的成书标志着满文篆字体式的完备，对完善、规范和推行满文篆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满文篆字乃是天聪六年达海对老满文加以改进后，随着新满文的出现而逐渐产生的，但当时尚不完备规范。直至满、汉文篆字本《御制盛京赋》完成，方使其水平达到顶峰。篆文三十二体分别为：玉箸篆、奇字篆、大篆、小篆、上方大篆、坟书篆、倒薤篆、穗书篆、龙爪篆、碧落篆、垂云篆、垂露篆、转宿篆、芝英篆、柳叶篆、鸟迹篆、雕虫篆、麟书篆、鸾凤篆、龙书篆、剪刀篆、龟书篆、鹤头篆、鸟书篆、科斗篆、纒络篆、悬针篆、飞白篆、殳篆、金错篆、刻符篆、钟鼎篆。它们保留了象形文字的诸多特

点，字体舒朗开阔，形象生动。例如穗书篆，其字收尾处如悬麦穗；转宿篆，其字开头饰有三颗星，似莲花未开时形态；科斗篆，其字貌似蝌蚪，运笔呈头粗尾细之势。综合观之，三十二题给人以视觉盛宴之感，既是满文字的再整理和新创造，也是汉满篆书艺术的创作与展现，在汉满文字、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

图 1 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刻本《御制盛京赋》龙书篆（汉文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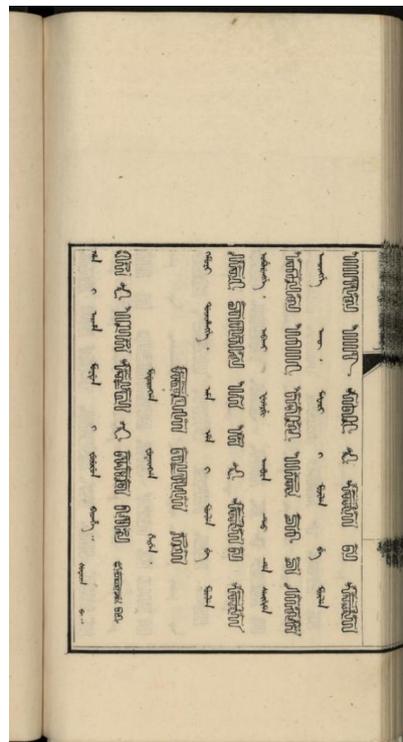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2 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刻本《御制盛京赋》龙书篆（满文）

《御制盛京赋》作为满文篆字集大成者，对规范清代宝玺以及各级官员印信用字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从此满文篆字不但应用于宝玺，而且应用于各级官员的印信，不同级别还对应使用不同篆体。满文篆字的完备，拉开了清代官印改铸的序幕。此外，虽然该书编纂的初衷是完善满文篆字，以用于宝玺印章等处，但在搜集仿照汉文篆字的过程中，亦将汉文篆字系统地进行了整理，使汉文篆字得以再兴。用汉满三十二体篆书书写和刻印的《御制盛京赋》共有汉满篆书各两千余字，数量超过汉字《千字文》，实则成为汉满文篆书工具书，对清代中叶以后篆刻与篆隶的流行影响尤其重大。

脱胎于中国古代赋体的《盛京赋》，其汉文本的创制本就意义非凡，在此基础上，将此气势恢宏的大赋译成满文本更非易事，后又用三十二体满汉篆字缮写，实属浩大工程。篆字本《御制盛京赋》的形成体现了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，堪称乾隆朝民族文化交融的一次创举。将汉文的三十二体篆字应用于满文上，给人以挥洒自如、大气磅礴的直观感受。

《御制盛京赋》问世后不久，便传播流布至域外。1770年，法国耶稣会的阿米奥神父将《御制盛京赋》翻译并在巴黎出版；1828年，法国著名的满文学者尤利乌斯·海因里西·克拉普洛特把满文原文的《御制盛京赋》登载在巴黎自己主编的《满文名著》中。大文豪伏尔泰看到法文版的《御制盛京赋》，与乾隆帝开启了友好往来，他作诗赠给乾隆帝，称赞《盛京赋》“柔美和慈和到处表现出来”^①，称赞乾隆帝“像一位作家或许比像一位皇帝更多些”，是“权力无边的君主，又是帝国最优秀的诗人”^②。乾隆皇帝无形中成为了满汉文化融合的积极推动者和有力传播者。民国间，该书亦大放异彩。“1932年3月，国际联盟为调查1931年‘九·一八’，派遣英国人李顿为团长，由英、美、法、意、德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到中国。调查团到达奉天（今沈阳），在当时的奉天图书馆，参观了三十二体满汉篆字《御制盛京赋》的展出。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操纵下，大连右文阁用玻璃版影印了三十二体满汉篆字《御制盛京赋》每体字首页，装订成册，共八十册，作为礼物赠送给调查团的主要成员作为到过奉天的纪念品。”^③此事生动地反映了《御制盛京赋》在文化交流及外交史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。

对我们当代研究者来说，该书不仅是宝贵的民族文化宝藏，而且是满汉文化交融的重要史料，更为研究满汉文互译以及满文篆字发展史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

^①张婷鹤：《论乾隆〈盛京赋〉的中外传播》，《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，2018年第4期，第185页。

^②卢秀丽：《乾隆〈御制盛京赋〉版本源流》，《满族研究》，2005年第1期，第96页。

^③卢秀丽：《乾隆〈御制盛京赋〉版本源流》，《满族研究》，2005年第1期，第96页。